

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讀《圍城》後感

合上《圍城》一書，閉上眼腦海中和眼前是一片星辰大海，睜開眼是帶著唏噓與一種心平氣和的無奈。幾年前初讀《圍城》，只是那時年齡尚幼，理解得不甚深刻，可以說是囫圇吞棗、淺嘗輒止；而這個假期，我重新走進了錢老先生的“圍城”世界。

圍城是本黑童話，來源於生活也體現著生活，書裡主人公的故事，其實映射著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圍城故事發生於1920年到1940年代，作者以幽默的筆調一針見血地寫著貌似與我們無關的一群人，卻揭露了包括你我，甚至所有人都試圖掩藏的赤裸裸的人性弱點。從書中所描寫的人物發展來看，並未將階級地位或經濟狀況作為影響愛情或婚姻生活的決定性因素，而是通過待人處事的細節與言語動作，讓人物去展示自身的特性，即原始人性，從而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甚至中西文化衝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

讀罷此書，最大的閱讀體會和藝術感受大概是錢鐘書先生那種凌厲的諷刺，借助那無所不在的諷刺之光，他從對知識份子形象分析入手，挖掘其困境、弱點和沾染的精神垃圾；書中我們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種無所不諷而毫不留情的諷刺意向，一種全面否定而一無保留的否定精神，一種普遍懷疑而又無所適從的悲涼心態，一種整體批判而又不給出路的厭憎情緒。雖然它也不乏一念溫柔，片刻歡笑和剎那的幻想，而且極富喜劇性的諧謔，但這說到底又不過是一種向著痛苦的微笑。恩格斯曾說過：一些優秀作品雖然缺乏正面的理想，但由於它通過對顯示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的幻想，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圍城》的政治色彩雖是淡漠的，但在對腐朽的、醜惡事物的辛辣無情的嘲諷和鞭撻裡，我們看到了作為一個愛國、正直的知識份子對於

進步和理想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它的積極的社會意義是不容否定的。錢鐘書先生以犀利的文化視角賦予作品深刻而豐富的內涵，使其成為不朽的篇章。

我們的一生，都在尋求歸屬感和認同感，被世俗所桎梏，掙扎在困境中，圍城之困，大概多少都存在於我們身上。錢老先生在書中設定了 70 多個人物，書中的人物時而讓人覺得可愛，時而讓人惋惜，時而讓人覺得睿智。“關於女人這份崇高而又平凡、嚴肅而又放蕩的考卷，傳至錢鐘書先生手中時，錢鐘書這位‘高傲的評家’倒是沒有屈膝為女人唱讚歌，而是趨步於另一極端。使女人向男性屈膝了，即透過謾罵、調侃女人遺憾地宣洩女人們的幽暗面，而其對女人的善良、聰明、賢淑的美好面很少提及，構築了中華文化史上又一文化憾事。”¹書中畫龍點睛的核心人物卻只有一個——方鴻漸，他處處碰壁、連遭失敗的生活經歷，揭示了人們受壓抑、難容於現實社會而遭受到的無法言狀的悲苦的人生困境，同時顯露出作為見過世面的知識份子方鴻漸在顛沛流離中的懦弱、矛盾。所以看他的生活就像在看自己，看他在公眾場合毫無臉皮地賣弄，看他的愛恨情仇，看他的家庭生活，看他處理世事時的窘迫謹慎，人情絲毫不練達，考慮毫無周到，他身上的軟弱、妥協、被動、隨波逐流不禁讓人反思。

與此同時，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過於《圍城》一書中“圍城”所體現的幾重意蘊。書本開篇，當方鴻漸從歐洲回國，此時的社會和國家是一個“圍城”。在上海度過一段歡樂時光之後，方鴻漸因戰亂被迫輾轉到內地三閤大學任教。隨後，方鴻漸與孫柔嘉來到桂林，兩人在香港結婚，再返回上海。方鴻漸在上海某報館任職後又辭職，因為趙辛楣的召喚正準備往內地重慶尋找新的機會。無論社會場景，抑或生活場景，在逃離了一個“圍城”之後，方鴻漸又闖入了另一個“圍城”。在一個個“圍城”中，方鴻漸進出其間，並與周圍的人上演了種種儒林鬧劇，這是時代的無奈，也是社會使然。喧囂的城市、荒涼的山野、骯髒的旅店、爾虞我詐的學校，方鴻漸每一次“出走”，都有充分的環境因素推動著他。

而本書幾乎所有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淺地涉及情愛，婚姻之困從一開始就貫穿全書。“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在回國的郵輪上，方鴻漸就與鮑小姐鬧了場不太光彩的

¹ 湯溢澤，李建南。《圍城》：女性形象跌落的滑鐵盧[J]。創作與評論，1999(4):54-57。

“露水姻緣”，到了上海後，在蘇文紈小姐的客廳裡，方鴻漸又“被迫”捲入了由蘇小姐策劃、主演、趙辛楣先生表演的一場爭風吃醋的“三角戀愛”。羞愧和憤怒讓他為此耿耿於懷，於是用“種種巧妙的詞句和精密的計算來撫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騙的情欲、被損傷的驕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反而搖擺得利害”。回上海後的空虛使方鴻漸不自主地接受了蘇文紈的邀請，以填補被鮑小姐拋棄之後倍感空虛倍感挫敗的心靈。由於沒有感情經歷的方鴻漸對女人內心的把握不夠，他又似有意無意的進入了蘇文紈的內心。方鴻漸擁有愛情的權利卻優柔寡斷，他怕傷害一個人而最終傷害了所有人。他對唐曉芙付出了所有的真心與熱情，對蘇文紈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結果卻一無所有，不僅激怒了蘇文紈、傷害了唐曉芙，也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傷痕累累。失戀之後的方鴻漸更讓人失望，他不僅沒有從自己的角度做出分析，反而給婚姻貼上了消極的標籤。方鴻漸第三次的感情糾葛發生在和孫柔嘉的婚姻之中，遭受連番情感挫折的方鴻漸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現實的無奈與殘酷，他那一顆受傷、疲憊、孤獨的心已無力追尋虛幻浪漫的愛情，只想尋找一個安定溫暖的歸宿，因此他將錯就錯進入了精明、柔韌、攻於心計的孫柔嘉千方百計建造的圍城之中。雖然方鴻漸認為“結婚無需太偉大的愛情，彼此不討厭已經夠結婚的資本了”並且結婚也給再次失業的他帶來了些許安慰與溫暖，然而卻發現一切遠非他想像的這樣簡單。在接觸初始，孫柔嘉會裝作是很無助小女孩，處處向方鴻漸請教會把一些事情做的毫無痕跡。訂婚以後，方鴻漸發現她在羞澀緘默的外表下有著“專橫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見而且主見很牢固”。所以訂婚才一個月，方鴻漸“仿佛有了女主人”，他所認識的那個溫柔和順、善解人意的孫小姐漸漸消失，正急於轉化為精明虛榮、武斷任性的方太太。婚後，方鴻漸深陷婚姻“圍城”，其守護人孫柔嘉也日益成為方鴻漸的暴君與精神囚籠。

但歸根到底，其實質是自我之困。與其說是社會和婚姻導致了人生的悲劇，不如說是內心與精神的缺失讓結局變得失意。自身的懦弱、動搖、優柔寡斷使個人在經歷種種沉浮之後每況愈下。《圍城》中的男女愛情不像通俗的小說那樣被外力“逼”到一個臨界狀態，作者大概就是要讓讀者看清楚，在沒有外力的干預下，男女作為獨立的個體將在情場上有一番怎樣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貴，人的懦弱在情感圍城的內外有一番怎樣的令人沉重的思考。作者對人性的態度並不是

消極的，因為讓讀者看到了愛的可笑和可憐，讓讀者在笑聲中發現人性的短處，這便是一種非常積極的高姿態的批判和矯正。《圍城》讓人在幽默的閱讀氛圍中領悟到人的自身的弱點，而不是放縱讀者去賞玩人的弱點。作者站在一個中西文化的匯合處，站在理智與現實的裂口處以一個睿智的學者作家的目光來打量人的弱點。《圍城》寫出了人們不願意正視的、真實的社會環境，真實的人性，這也是它的文學價值所在。

每個人根據其年齡與所處環境都有一個專屬於自己的圍城，這個圍城像“回”字一樣裡外兩層，外面的大致是你的生活和環境，“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在外而見喜樂的人想進去，在裡而受哀怒的人想逃離。但無論進還是出，決定你境遇也好，未來也好，大部分是囿於裡面這個圍城，這個圍城是你的“本我”——大致是本我的性格、經歷及原生家庭給你的深遠影響。正如《麥田守望者》裡說的，“你千萬別跟任何人談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談起，就會想念起每一個人來。”你我有這樣的念想，也會想起一切和我們有羈絆的人來，所以假若我們在現實面前妥協，還得周而復始地生活。

但是生活是無意的，是自己圈地為牢，把自己局限在那一方狹隘之地；生活不是圍城，生命掌控在自己手中，路是走出來的，儘管很多時候並不如想像中順遂，但是無論正經歷著開心或難過，低谷或高峰，都需記住如果事與願違，就相信一定另有安排。正如錢鐘書在《寫在人生邊上》一書中說：“人生雖痛苦，但並不悲觀。”往事不回頭，餘生不將就。前路迢迢，人要學會且行且珍惜，隨緣隨自在，想要的都擁有，得不到的都釋懷。如此，何必苦苦糾纏這麼多呢？

成長路上，我們無法衡量那些“獲得”和“失去”占的比重，小時候希望得到的都得到了，小時候深信不疑的卻顛覆了。世界最大的不變就是變化，而我們也應坦然地接受現在自己的擁有與沒有。

世界太闊，我們經歷的冷暖和磕碰一轉眼就消失在世間的聲色裡，披星戴月的奮鬥能帶來厚利也能帶走平凡的快樂，而我們心底最渴望得到的到最後也未必明瞭。“時間也饋贈了我其他的禮物，有些是你期待的，有些是驚喜，還有一些，恐怕曾被你鄙夷。然而我不心虛，就算有再多不甘心，我並不愧對你。”

願你在被打擊時，記起你的珍貴，抵抗惡意；願在迷茫時，堅信你的珍貴。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洞明世

事，待人處事，無愧於心，積極向上，我想這大概是圍城上的最寶貴的一課吧！

參考文獻：

[1]周曉晨. 知識份子的人生困境——淺析《圍城》中方鴻漸的悲劇意蘊[J]. 開封教育學院學報, 2016, 36(1):24-25.

[2]黃金花. 淺析《圍城》中的人性弱點——以方鴻漸為例[J]. 赤子:上中旬, 2014(11):42-42.

[3]武連娣. 最真實的人性的弱點--佟振保、方鴻漸形象對比分析[J]. 青年文學家, 2014(11Z):18-19.

[4]胡奇. 淺析《圍城》中蘊含的文化批判[J]. 劍南文學:經典閱讀, 2013(8).

[5]高春慧. 《圍城》中的語用隱含的身份建構功能分析--以方鴻漸與四位元女性的對話為例[J]. 學理論, 2013(33):193-195.

[6]何永波. 試論《圍城》的文化批判價值[J].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 38(4):112-115.